

战役记

纪念黄淮海科技战役**40**周年

石元春 / 著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PRESS

战役记

纪念黄淮海科技战役**40**周年

石元春 / 著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PRESS

内 容 简 介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针对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的综合治理和农业发展，国家组织过一场长达28年的科技大战役。由于战役的巨大成功，推动了我国涉及20个省市、3.8亿人口，4.7亿亩耕地的低产田治理工程，为结束我国千百年缺粮历史做出了重要贡献。该成果获“199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本书是参加该战役的首席科学家写的一部回忆录，记载了此次科学登攀中真实、动人、跌宕和励志的故事。章回小说体裁和流畅生动的文字将给读者带来轻松愉快的阅读享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役记：纪念黄淮海科技战役40周年/石元春著.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3.8

ISBN 978-7-5655-0827-1

I. ①战… II. ①石…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0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4842号

书 名 战役记——纪念黄淮海科技战役40周年
作 者 石元春 著

策划编辑	汪春林 丛晓红	责任编辑	丛晓红 吴枫桐
装帧设计	李尘工作室	责任校对	王晓凤 陈莹
出版发行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193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2号	读 者 服 务 部	010-62732336
电 话	发行部 010-62818525, 8625 编辑部 010-62732617, 2618	出 版 部	010-62733440
网 址	http://www.cau.edu.cn/caup	e-mail:	cbsszs@cau.edu.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25印张	370千字
定 价	148.00元		

图书如有质量问题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作者序

近千年里，中国一直过着缺粮的日子，20世纪60年代初连续三年还发生过全国性饥荒。黄淮海平原是中国第一大平原、主要农区，本是个粮仓，却因旱涝频繁和治水失误，导致土壤“盐灾”，不仅不能给国家上交粮食，每年还需要国家调运来大批救济粮。

1973年，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由当时的国家科委领导，在河北省组织了“黑龙港地区地下水合理利用”的国家科技大会战，有来自河北、武汉、长春等地59个科技单位的400余名科技人员参加。这年，一批北京农业大学老师在河北省邯郸地区曲周县设立了旱涝碱咸综合治理试验区，参加了这次科技大会战。

自1978年国家发布《1978—1985年全国科技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开始，国家科委继续将黄淮海平原中低产田治理列入了“六五”、“七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在国家科委、农业部、水利部和林业部共同主持下，有冀、鲁、豫、苏、皖五省和京、津二市的一百多个科研教学单位的一千多名科技人员参加。这个历时20年的国家大型的和综合性的科技攻关项目，曾对我国科技、农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有过一定的影响与贡献，并获得199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八五”和“九五”期间黄淮海项目继续被列为国家科技攻关项目。

黄淮海平原中低产田治理在生产和科研上的显著成效，带动了三江平原、黄土高原、北方旱区和南方红黄壤四个地区的中低产田治理，进而促进国家投资540亿元，实施了长达12年的全国性中低产田治理（1988—2000年），范围包括黄河河套灌区、河西走廊、沿海滩涂等十大片，涉及20个省、市，3.8亿人口和4.7亿亩耕地。全国性的中低产田治理对扭转我国缺粮

的历史，对1996年全国粮食总产过5亿吨，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1973—1978年国家科委组织的“黑龙港地区地下水合理利用”科技大会战，到1980年开始的“六五”至“九五”黄淮海国家科技攻关，这是发生在我国的一项持续28年之久的、跨领域和学科的大型综合科技攻关项目，即黄淮海科技战役，距今已整整40年了。

2011年9月，个别人为了发泄私愤和报复，全部用虚构“事实”编造了一个二三十年前的所谓学术腐败故事，在互联网上诋毁本书作者，其内容主要是拿黄淮海国家科技攻关项目说事。经上级半年多调查，做出了举报没有任何根据的结论。作为黄淮海项目的第一主持人的本书作者，有责任挺身而出，捍卫这段历史，捍卫这项集体成果与荣誉，捍卫个人尊严。

为了应对谎言，不得不将封存了二三十年的参加黄淮海项目研究的“故纸”翻找了出来，一些零散的记忆片段被逐渐拼接了起来。于是将它整理成书，一本是学术性的《黄淮海平原的水盐运动》，一本是回忆性的《战役记》。两书虽体裁迥异却能互补相映，时段都是1973—1993年，不含“八五”和“九五”期间的黄淮海项目。

尽管本书作者曾是黄淮海“六五”和“七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第一主持人，但面对如此恢弘的科技大战役，也难复其全貌于万一。《战役记》仅就个人的经历，身边发生的事，以及手头保存的不完整资料整理出一些记忆片段。以耄耋之年，回忆二三十年前的往事，难免在事、人和时间上出错，诚望读者，特别是曾参与此科技战役的战友不吝指正。

为了力求恢复历史原貌，全书按时间顺序叙述，并将手头掌握的有关文件、史料和照片等随文附上。书文及所附资料和图片中会涉及到许多的人与事，如有不当或冒犯处望请原谅。本书是作者个人的看法与感悟，难免有偏颇甚至错误之处，一并望请谅解。

《战役记》是纪实性的，但也要考虑到可读性。

在可读性方面，作者先是按常规分章分节写法，总觉前后不好安排。偶以章回小说写法一试，感觉不错，于是以时间为轴，以重要事件为内容，配以图片，像讲故事般地写了下来。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对这种体裁没有写作经验，实乃效颦，自娱自乐，引读者一笑罢了。

本书上篇“十年一剑”共计24章，写的是1973—1983年，由建曲周试验区到建曲周实验站的10年，是黄淮海战役的“黑龙港前哨战”中一个战斗小分队的战斗经历和成长历程；下篇“走向黄淮海”共计21章，写的是作者于1979年逐渐由曲周试验区走向黄淮海，和一个作为“六五”和“七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第一主持人对黄淮海科技战役的记述。

2013年是黄淮海科技战役40周年，也是北京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建站40周年。作为参与者的作者，谨以《黄淮海平原的水盐运动》与《战役记》二书作为40周年纪念的一份献礼和心意。

成书过程中，曾参与曲周试验区的一些老师和战友对初稿提过许多宝贵意见；张国财老师、曲周县文化馆和胡文英同志等为本书提供了大量图片，有些照片的摄影者已难查询。过去的许多纸版的书刊、文章、报告，以至油印稿和手写稿需转换成电子版文稿，这是一项十分繁重和细致的工作，王崧和崔萍两位老师付出了许多辛劳。作为“战役”中的战友和老伴，李韵珠教授给予了悉心帮助，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汪春林社长和丛晓红副总编为此次出书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谨此一并致以谢忱。

石元春 完稿于2013年初夏的北京



序幕：结缘 1

■上篇 十年一剑——曲周试验区

1. 难抗命迁校延安，罹“克”疾回京疗养	6
2. 来电话七三六一，定未来后半今生	11
3. 仲夏日初探虚实，定大计夜话曲周	17
4. 进张庄涝水相迎，三透房安营扎寨	24
5. 苦思索作战方略，精谋划首份蓝图	35
6. 设样板四百亩地，前哨战打响试区	42
7. 开局年百事待举，王观澜视察督阵	51
8. 情报网建设在即，化验室刻不容缓	59
9. 办农校培训农民，育人才千秋基业	65
10. 抖秘籍综合治理，摆阵势以正相合	74
11. 出奇兵战绩喜人，靠科学镇住老碱	80
12. 论成败产量为上，种麦场人机比武	88
13. 起风波封杀浅井，辛德惠单刀赴会	96
14. 初来客不知深浅，苦遭遇省委书记	100
15. 迎风雨我行我素，且徐行何妨吟啸	107
16. 治理期四年一贯，创高速产治双赢	112
17. 谋推广梦系曲北，喜碰杯双五百万	122
18. 为验证再建试区，抒豪情叫板麦产	131
19. 阿金斯当场拍板，借外力圆梦曲周	138
20. 诚可贵河北认同，许铁城箴言六条	147

21. 同心铸十年一剑，高意境水乳交融	155
22. 固基业曲周建站，正喜迎不惑之庆	164
23. 讲奉献义无反顾，苦生活乐寓其中	177
24. 为治碱鞠躬尽瘁，忆战友不用扬鞭	185

■ 下篇 走向黄淮海

25. 改革风吹绿大地，黃淮海春意盎然	196
26. 图治理星火点点，两部委整编成军	203
27. 增战力技术强军，抢时间引进派出	208
28. 搞区划由点及面，树信心媒体热议	217
29. 推进器一虚一实，引外资筹措粮饷	227
30. 冀夯实理论基础，促知行双双升华	235
31. 得天时平原风起，集结号济南吹响	243
32. 三结合论剑曲周，四年整完成备战	252
33. 喜打响六五战役，初受命领军出征	260
34. 带队伍走出国门，请高人指点迷津	267
35. 济南府国际大会，提素质联合“军演”	275
36. 勤耕耘六五丰收，以一斑试窥全豹	289
37. 谋七五两线作战，布奇兵巧赢全盘	296
38. 大决战帷幕轻启，催战鼓捷报频传	305
39. 李总理一线视察，北戴河作客休假	313
40. 黄淮海效应放大，促结束缺粮历史	320
41. 中国年随团访苏，黃淮海再出国门	327
42. 迎挑战请缨攻坚，奔前沿国际领先	336
43. 十二葩各献一方，六利剑游走三河	348
44. 荣特奖项目荣光，画句号急流勇退	358
45. 除三害20年检验，新双魔又布阴云	369
附：黃淮海科技战役大事记（按本书内容）	377

序幕：结缘

1960年早春。

北京农业大学校门外，开往西苑的公共汽车车站。

天未亮，马路上的路灯还亮着，行人和车辆稀少。

一个年轻人斜挎着野外考察用的厚帆布背包，包里鼓鼓囊囊地装着些什么，肩上扛着一米多长的洛阳铲，在寒风中等待着头班公共汽车。

汽车来了，车上没几个乘客。年轻人快步登上汽车，找到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将背包放在身边，洛阳铲放在座旁的地上。

西苑转车到动物园，天开始亮了起来，吃些早点，再转车到永定门。去永定门的车要经过城里，城里车多人多站密，车走得很慢。永定门是去南郊的长途汽车总站，来往乘客很多，熙熙攘攘。这个青年人买到车票，登上了去大兴县的郊区车。车行半个多小时，到县城黄村站下车，步行十三四里才到达目的地——芦城公社的一块采取土样和水样的盐碱地。这一路上花了三个多小时。

到鹿城村已是上午十点左右，连歇脚喝水的时间也省去了。放下洛阳铲，打开背包，取出土袋、铝盒、水样瓶、剖面刀等一应家什后，开始用洛阳铲取土，这就要靠两臂的力气了。每钻20厘米深取一份土样，一直取到2米以下的地下水位。再将由一个绳子吊着的、擀面杖粗细的铸铁小桶放进钻孔里，一桶一桶地采取埋藏在2米以下的地下水样。

取一个样点的土样和水样要用半个多小时，取完两个点，太阳已经当顶。坐在田埂上，吃几口干粮，对着军用水壶喝上几口水。稍事休息，再取三个点。然后取出地形图，在标记好的取样区勾画盐斑图。此时，太阳已经偏西，按原程返校，但这时的挎包里已装满了二三十斤重的土样和水样。负

重步行十几里是这一天最累的活儿，没有了矫健步履，只见那疲惫的身躯。

已经是万家灯火，回到家里，一股脑地摊倒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

如此地每月取样一次，除去冬三月，一年要取9次。每次取的土样和水样都要做8种易溶盐离子的化验，还有土样的含水量，约是三四个工作日的工作量，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干了整整四年。那几年，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一个30岁刚出头的小伙子，能量的主要来源是每月的29斤粮食、2两肉和半斤油。

为何做得如此这般的辛苦与执着，是项目吗？不是；是上级下达的任务吗？也不是。只是因为要回答自己给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黄淮海平原的水分和盐分在土壤和地下水里周年是怎么运动的？

1956年，他研究生毕业，随导师参加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四年，没少与盐渍土打交道，见识过准噶尔盆地大面积的脱碱化盐土、南疆的蓬松盐土、艾比湖厚达1米的盐壳，与苏联专家在塔里木农场一起做过盐碱地改良试验，也见到新疆建设兵团农场开荒不久，因灌溉不当发生土壤次生盐渍化而整个农场被迫迁走，在戈壁滩里留下的那一排排无人居住的新房。

1959年，他回校任教，担任土壤教研组秘书。

时逢黄淮海平原在1957年大搞水利化运动中，因重灌轻排和平原蓄水的错误治水方针，冀、鲁、豫三省的盐碱地面积由2 800万亩猛增到4 800万亩，农作物大幅减产，农民谈水色变，谈盐色变。在参加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有专家说要停灌大排；有专家说要像南方一样搞河网化种稻；有专家说全面修台田，沟里种稻，台上种麦；有的说……，莫衷一是。此时谁也说不服谁，谁说了也没有用，大家都饿着肚皮，谁还有力气干活。

按理而论，这里盐碱地里的盐分比新疆少得太多了，新疆年降水量200毫米左右，而这里是600~1 000毫米，盐碱在这里怎么会闹得这样凶？一番地理对比，启发了他：虽然这里降水多，但过于集中，雨季脱盐而旱季返盐，加以平原地形低洼易涝，所以旱涝与盐碱会同时发生，这在新疆是没有的。显然，这里的自然条件比新疆复杂得多，关键是要弄清楚周年里水分和盐分在土壤和地下水里是怎么运转的。不搞清楚水盐运动规律，就谈不上怎么治理这里的旱涝和盐碱。自己提问题，自己找答案，这才有了上面说的那



四年如一日的“苦斗”。

1964年，北京农业大学到涿州农场搞半农半读，他担任四区队分管生产的副区队长。不可能再去鹿城公社取样了，只好抽空整理过去的观测资料。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个土壤教研组秘书也“滥竽充数”地被土化系革命小将宣布为“走资派”，编到了总支书记和系主任等组成的“牛鬼蛇神”队伍里监督劳动，接受革命群众审查。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除家庭成分高了点外，主要是他是土化系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枪打出头鸟”嘛，这很正常。再说，那四年如一日地到大兴采取土样水样就是走“白专”道路的铁证。

记得是1968年夏天，一天中午饭后，土化系革命小将敲门进他家，严厉宣布：“我们代表革命群众搜查你家！”他和抱着才半岁女儿的妻子站在房间外面，接受“革命群众”的“抄家”。水盐运动的观测资料是打包在一个纸箱里的，一起被抄走了。原本以为这些资料会还回来，但以后再也没有见到。

四年的艰辛与执着付之东流，一个稚嫩的科学梦想成为“一枕黄粱”。在那个年代，每个人都必须学会逆来顺受与吞咽痛苦的本事。

这个年轻人初战黄淮海，却折戟“文革”中。

北大教授、红学大师俞平伯的力作《红楼梦辩》书稿在送往出版社途中不幸遗失在黄包车上，而沮丧万分。不想朱自清在逛旧书摊时发现了这包书稿，几文钱就让它物归原主了。俞平伯先生将书稿又作了修改，于1952年以《红楼梦研究》付梓，轰动一时。不料，却惹来毛泽东1954年亲笔批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起了一场批判俞平伯红学研究的运动，俞先生成为了“名扬全国”的“反动权威”。这倒是应了“塞翁失马”的那则寓言。

这位年轻人的运气比俞前辈好得多，居然十年后再拾研究，旧梦重续。他在睡梦中张开双臂，轻声地呼喊着：

啊。水盐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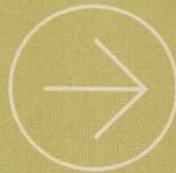
啊。旱涝盐碱综合治理！

他的梦想成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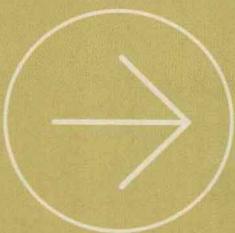
■ 战役记

他参加了黄淮海科技战役。50年后，还写下了《黄淮海平原的水盐运动》和《战役记》。

俞平伯前辈晚年重提他书稿失而复得之事时，不无感慨地说：“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这个年轻人能参加黄淮海科技战役和这两部著作的出版莫非也是前定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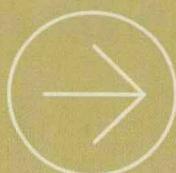


上篇



十年一剑 ——曲周试验区

在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代，一个
多灾多难的平原上组织了一场科技
大会战，使曲周试验区出现在黄淮
海平原上。



1. 难抗命迁校延安，罹“克”疾回京疗养

话说50多年前，那“大跃进”年间。

1958年7月，“大跃进”热火朝天，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到北京农业大学视察，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点名批评北京农大农场小麦产量太低，当场质问北京农大教授、我国著名小麦专家蔡旭。

“河南遂平县农民的小麦亩产5 000斤*，蔡旭教授，你能打多少斤？”

“我不行！”蔡旭教授非常尴尬地回答。

“你能打多少斤？”康继续追问。

“顶多六七百斤。”蔡说了实话。

“好啊！农民将了教授一军，农业大学的科学宝座、教授宝座已经动摇了，现在发生了农民还需要不需要农业大学的问题，农业大学的牌子应该挂在哪里的问题。”

他还提出今后教授评级、学生评分以产量为标准。亩产5 000斤的评为一级教授，亩产1 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农大毕业生能搞到5 000斤的可评特优，2 000斤的2分，1 000斤的1分。

事后，康生向毛主席汇报说：“全国高校中以北京农大等三所农林院校最为落后。”毛主席当即作了指示（1958年8月1日）：“北京农大全校下放农村劳动锻炼一年。”这年8月中旬，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出了《关于改进农、林大专院校教育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

《指示》中指出：“所有在大、中城市举办的农、林大专院校，一律迁往农村或林区办学。”毛主席在此次讲话中还说：“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

* 1亩等于667米²；1斤等于0.5千克。



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注：以上参考了陈徒手在《同舟共进》杂志2012年第6期撰写的《蔡旭：“学堂小麦王”的苦恼》一文）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吃饭可以不要钱！”“全民皆兵！”“赶英超美！”……

“牛”吹得越来越大。1958年是中国有领导的全民疯狂的一年，反科学的一年。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败和成千上万人被饿死，当时也顾不上落实“农、林大专院校，一律迁往农村或林区办学”的指示了。

可是这事儿并没完。刚吃饱饭才几年，1966年又来了更加疯狂的“文化大革命”，重拾“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的最高指示，还加上后来林彪的一号命令。

这次，北京农大是在劫难逃了。

由校军宣队做主，举校迁往革命圣地延安。好几千人的一所大学，还是拖家带口的，安置很不容易。经校军宣队与延安地区革命委员会商定，被安置在甘泉县清泉沟里的一个被荒弃的劳改农场里。这里有不少劳改犯曾住过的废弃窑洞，一排一排的，还有劳改犯在沟底和山坡上开荒出来的几百亩地荒着。

问题是，劳改农场为什么要搬走？

因为这一带是克山病高发区，劳改犯因得病每天要拉出去几个埋了。“文革”中，知识分子是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臭老九”，所以将大学安排在劳改农场也不算受多大委屈，是理所当然的事。

清泉沟是黄土高原上流水切割出的一条中等大小的沟壑，深约百米，中段宽处不过二三百米，两侧山坡树茂林密，上游泉眼在沟底汇成小溪，蜿蜒婀娜地静静流淌，真是一个世外仙境般的好去处。可惜，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却暗藏着杀机。克山病是一种地方病，据说是因饮用水中缺硒引起心肌缺血和劳损。畜牧系老师在这里养的鸭子，解剖出的心脏跟豆腐一样，放在手上就能被抖碎，一点弹性和韧性也没有。这种病特别眷顾那些适应能力差的“外来户”和劳动量大的人，这两条我全都能占上。

1970年夏天，我作为“先遣队”队员第一批来到清泉沟，为全校大队人马的到来做准备。初冬，就举家举校地搬到这里来了，有的住在沟口，有的

住在沟里。这里没有大学生，只有老师在那里种地和改造思想。土化系有两位一级教授，一位是我的老师李连捷，60多岁了，在深山沟里学习张思德，扛木头烧炭；一位是土化系系主任黄瑞伦在沟口烧开水，被批判是“一块钱烧一杯开水的资产阶级教授”（当时一级教授月工资高达360元）。还有植保系的一级教授、北京农大副校长沈其益在沟里喂驴，经常挨批，说他的动作比驴还慢。

我们这些中青年教师当然是学习“南泥湾”垦荒精神的劳动主力军了。

学校种的地大多在沟底，根据校革命委员会的指示和系革命委员会的安排，指令我负责在清泉沟的中上游段“截溪为库”，引水灌溉，这本也是土化系的专业职责所在。修水库（实际上是个大蓄水池）是个重体力活，我每天都在水库工地上，东奔西跑，挖土推车，填土夯地，凿石垒坝，劳动量很大，人称我是“库长”（与“裤”谐音，不是现时时髦的“酷”）。

那一年时运不济，噩耗不断。一次在水库一侧的黄土坡上用炸药开山，不想被炸飞起的一个黄土块落到了沟的另一侧，砸在一个正在凿石的老乡头上，当场毙命；后又传来两位兽医系老师在后山烧山开荒中被烧死；几天后，又有三人险些丧命工地。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在我指挥的水库工地上用炸药炸山，有个炮眼未响，等了半个多小时还无动静。此时大家已经收工回去吃午饭了，我和王坚、曾宪榕商量一起去炮眼看看，并未发现异常。我们说走吧，下午上工时再处理，老曾走在前，我随后，王坚最后。突然一声巨响，王坚一下被抛了出去，我的后背像受到一块门板的猛击，向前冲跌出几大步，一头栽倒在地上（找到了被炸死的感觉）。过了好一会儿，走在我前面，离爆炸点稍远的曾宪榕先从地上爬起来，喊道：“石元春！”“这儿啦！”我答应。他把我扶了起来，两人一起喊：“王坚！”没有回应，我们互相搀扶着走回到爆炸处，王坚已昏厥过去。这次我们仨险些为国捐躯了。

“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我的挨炸关过去了，克山病关不能幸免，心悸心慌越来越频繁。1972年冬天到延安医院一检查，一张诊断书给我戴上了“克山病”的帽子，当时叫拿到“延安革命”毕业证书，即不久可“出沟”异地治疗了。



在沟里，孩子抵抗力最弱，“大骨节病”和“克山病”双双袭来，家长们忧心忡忡而又不敢言，怕扣上“不安心扎根农村”和“给革命圣地抹黑”的罪名。1972年夏天，校革命委员会终于开口，说家长可以将孩子送出去“投亲靠友”，于是我赶紧把两个孩子送到武汉他姑姑家。1973年春节后，校革委会批准我可以回京“异地疗养”，但苦的是把妻子李韵珠一个人留在了沟里，真叫人不放心。谁愿意“两地分居”？但也不想韵珠因罹病而出沟，心里着实矛盾。

1973年早春，北京还很冷，我回到了原北京农大校园，颐和园的北面。

自1967年林彪一号命令，大机关大单位纷纷搬离北京，北京农大搬迁到涿县，到这次我重新回到校园，已经过去了五年。这五年里，国家、农大、家庭和自己发生了太多太多、太太太大的事情和变化，这个曾经长期工作和生活过的校园也显得苍老和毫无生气。

校园里已经没有了昔日教师执鞭授课、没有了学子琅琅读书的身影、实验室夜间的灯光和体育场上健儿的身影；这里也没有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没有了高音喇叭传出的令人撕心裂肺的“通令”和恐怖的音乐；没有了戴着高帽子在校园游街的老教授。一切又回归于宁静，这时的校园已经被移交给了一个军事机关，只是暂时留下了几栋楼作“留守处”处理后事，负责人是孔繁良。

“留守处”安排了几间教室作为延安“异地疗养”和因病因事不能去延安的老师的集体宿舍。土化系有秦树国、刘合源、吴金如和我等五六个人住在教学楼一层西头的一间大教室里。在这个“集体宿舍”，沿四墙放着几张单人床，每张床前有个二屉桌，供看书写字和生活之用。房中间还有个比较宽裕的活动空间，爱踱方步的刘合源可以后背着手，凝神思考，来回转圈，不时发出高论。

每天我们三三两两，敲着饭碗，溜溜达达，一日三餐地吃食堂。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没有任何家务牵挂，过着好不惬意的单身生活。高兴的时候，也会到西苑餐厅去吃熘肝尖、炒饼什么的，打顿牙祭。其实，食堂饭菜挺好吃的，至今仍想吃而不得。因为校园里特别安静，晚上和中午觉睡得很踏实，其他时间就是聊天、下棋、看小说，悠闲自在极了，大有“春游芳草